

# 郑古悦

TAY KOH YAT

1880—1957

郑古悦巴士有限公司创办人  
金门会馆主席



郑古悦，1880年出生于金门县浯坑乡（今吴坑）。8岁丧父，11岁入私塾就读。1902年，22岁时南来新加坡谋生。

与同辈的王文达不同，没有良好家庭背景的郑古悦初到新加坡时，只能在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 俗称源顺街）8号的源成兴九八行做杂工，每月工资2元。一年有24元收入，他将18元寄回家乡，平均一个月只有五角钱使用。

1910年，郑古悦加入源成兴公司为股东，两年后自创顺源公司，设分棧于印尼的檳港，1921年又创设益成兴公司，设分行于吧城（Batavia，即今雅加达 Jarkata）和泗水（Surabaya），从事爪哇郊咸鱼生意，他每天四点钟到驳船码头（Boat Quay 俗称十八溪墘）去点货。翌年又在新加坡设立振裕成公司，专营印尼各港土产杂货的进出口贸易，以咸鱼，鱼干为大宗。

在众多金门先贤当中，人们对郑古悦这一姓名应该是最有亲切感，很多老一辈的都有乘搭郑古悦巴士的经验。郑古悦巴士有限公司就是郑古悦创立的。

1934年，政府限制六座、七座微型巴士（Mosquito bus），不再允许川行市区，只能在郊区

川行，把市区公共交通的专利让给新加坡电车公司（Singapore Traction Co, 或STC）。同时，根据政府规定的十条路线，组织巴士车公司经营交通服务。不久，随着大型巴士的到来，经营这些巴士的车主便以这十条路线为基础，合资组成十家华人经营的大型巴士公司。这些华人巴士公司绝大部分被福清和兴化人资本所垄断，只有郑古悦巴士公司这一家是由金门人所创办的。这十家华人巴士公司的车队川行于乡区到市区的重要交通线，帮助市民解决交通问题。1949年间，郑古悦巴士公司拥有大型巴士60余辆，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华人巴士公司之一。

郑古悦在经商之余亦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他何时开始参与金门会馆事务暂时无法确定。民国十一年（1922年），金门会馆开会讨论金门禁种烟苗之事，郑古悦在大会上提议金门会馆电请全国及万国禁烟会援助。这是郑古悦参加金门会馆事务的最早文献记录。

1925年，蔡嘉种回家乡金门平泉，郑古悦捐献500元。立碑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重建孚济庙碑记》载，郑古悦与黄金钟、蔡嘉种、陈芳岁及陈景兰等人，同列金门会馆董事之职。



郑古悦逝世时的送殡队伍。

1928年，金侨成立了金门保董联合会，筹款赈济匪患横行及瘟疫连连的家乡。郑古悦曾捐款予金门保董联合会。

1933年，郑古悦出任金门会馆副会长之职，隔年被推选为会长。从1934年至1938年，五次被推选为金门会馆会长，1939年与1940年任副会长。战后1948年再出任会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郑古悦便是领导金门会馆推动本地与故乡公益事业的主干。

自晚清年代以来，中国饱受战乱、天灾与人祸之苦。民国成立后，福建省匪患日益严重，土匪勾结官兵，鱼肉百姓、民不聊生。金门虽然地处闽南离岛，同样饱受匪乱。1933年10月，金门县长郭昌文给金门会

馆发了一封信函，要求金援16,200元，以改善金门治安。此外还提出八条《陆防办法》，内容包括补充枪械、建筑碉堡、安置军用电话、装置探测海登、扩充警卫与组织守望民兵。金门会馆去函在家乡的吴光枰、许允楫、蔡嘉种、陈景兰、洪朝焕等接洽研究海防问题。经讨论，海陆兼防总共37,000余元。金门会馆旋成立“金门海陆保安会”向南洋各地金门乡侨募款、捐防。

1934年11月，郑古悦以新加坡金门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要求代电福建省政府于闽侨联席会议、南京侨务委员会，要求严缉盗匪，保卫地方治安。

1935年10月，郑古悦返乡，除了视察金门保安与路政，还对家乡的方方面面作了考察。回新加坡后，郑古悦在金门会馆开会时，对家乡的观感作了一番陈述。从郑氏的叙述，可以感受到郑古悦颇为不满家乡建设速度的缓慢与落后。

早在1932年，郑古悦就参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的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陷入全面抗日战争。1937年10月27日，金门被日军舰队猛烈轰炸后被占领。28日晚，以郑古悦为主席的金门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救济，会议上董事王丙丁建议先汇5,000元国币至厦门的洪朝焕、董源耀及黄肖岩以解决燃眉之急；王丙丁同时提出九条献议，包括设立收容所，营救金门难民；金门会馆还委托《新国民日报》刊印一份《新加坡金门会馆为救济金门难民告海外金门同侨书》，分发各地金侨。然而杯水车薪，面对残酷的战争，金门会馆能做的极为有限。金门难民投函金门会馆，痛诉金门已甚于人间地狱。

1938年2月6日，金门会馆召开会议，议决办学，并成立以陈受益、郑古悦、董春波等17人的创校筹备委员会。然而，倡办学校的事情随着马来半岛战云密布而被迫中止。



郑古悦巴士（1956年摄于合乐路）。

Credit - F W York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郑古悦参加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5月加入由侯西反领导的募捐队，投入募捐及筹款工作。1938年1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议决代募福建建设公债，郑古悦、侯西反、陈文确和郭可济四人分别受委为大小坡东西各区主任，致力于劝募工作。1939年1月，新加坡闽侨各会馆演剧筹赈委员会决定于1月21及22日两晚假座皇宫戏院演剧筹款救国，郑古悦加入售票股特别队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劝售入门票。

1941年，陈嘉庚等华社领导受殖民地总督之邀，于12月30日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会址设在晋江会馆），协助英殖民地政府抗战。抗敌动员总会设总务（主任：叶玉堆，副主任：刘玉水）、劳工服务（主任：林谋盛，副主任：刘牡丹）、宣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唐伯涛等）、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副主任：胡铁军）及保卫团（主任：郑古悦，副主

任：黄奕欢、陈锡清），负责治安救护、群众宣传、雇佣劳工等工作。时年61的郑古悦担任保卫团主任之职，职责是从市区挑选团员，然后在每条街道设岗，轮流守卫与维持治安，并且负责防空与救护等工作。

后来局势恶化，郑古悦离开新加坡，避难于泗水。光复后，郑古悦重返新加坡，与许允之等发起“日寇及检证杀害集体鸣冤大会”。1946年6月2日，由《南洋商报》提议、全星华社支持的“华侨被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大会”于中华总商会举行，并当众推选37人组成“华侨被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委员会”（简称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由郑古悦担任主席，其任务在于调查日本侵占新加坡和马来亚时期华侨所受生命财产损失，搜集证据，聘请律师，向战犯法庭抗诉，务使元凶战犯受公审判处死刑。行刑时郑古悦被邀莅场监刑。

新加坡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处理的第二件事是

向日本索回沦陷时期被日军迫缴的五千万元“奉纳金”，作为马来亚各地蒙难侨胞家属之救济金，及各地侨胞福利事业基金之用。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成功获得政府允诺，将沦陷时期华侨被迫缴之五千万元“奉纳金”，列入马来亚及新加坡对日本战债索偿款项之内。

由于对抗日有功，1948年11月19日，郑古悦先荣受总督颁发S.G.H.奖状。1952年12月，郑古悦再荣获英皇授予英帝国四等勋章(O.B.E.)。当时一共有22人获颁奖章，郑古悦在获颁勋章所有人之中为年纪最长。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急转直下，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积极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反共，战后在新加坡的国民党党员多达五千人。1947年国民党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郑古悦受委为《中兴日报》主席，社长为陈国础。1949年5月17号《中兴日报》在晚晴园举行创刊两周年鸡尾酒会，出席者有华民政务司及各国领事。不到半年，国民党政权便退守台湾。作为《中兴日报》的主席，其政治倾向是明确的。

郑古悦童年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因此对教育特别珍惜，他曾于1920年捐献100元予华侨中学的创建，并从1930年代开始参与教育工作。他历任多间学校的董事，如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中华女子中学以及兴亚、启蒙、崇正、崇本、菩提等学校的董事。

郑古悦也积极参与社团工作。除了在金门会馆担任领导职务之外，他也多年担任中华总商会董事和福建会馆董事(1941年6月当选福建会馆总务科主任)、爪哇郊公局主席、荣阳堂郑氏公会主席、新加坡华人互助会主席、佛教总会常务委员、佛教居士林董事，以及吾庐俱乐部董事。光复后的新加坡，百业待兴，德高望重的郑古悦于1949年被推选为同济医院主席，任内呈请总督批准该院为正式慈善机构，凡捐助医院的款项，均得豁免所得税。郑古悦虽是福建金门

邑人，但他也关怀本地非闽南社群，例如不止一次捐助碧山亭万缘胜会。

1949年7月郑古悦受总督金森爵士(Sir Franklin Gimson)委为华人参事局委员，其他委员包括王丙丁、叶玉堆、杨纘文、李伟南、林师万、符致逢等。有鉴于郑古悦平生热心慈善事业，贡献社会不浅，总督金森爵士特于1950年11月向他颁赐荣誉勋章。

1957年1月30日郑古悦与世长辞，享年77岁，葬于咖啡山闽冢之原。《金门会馆大厦落成暨成立壹一六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公元1957年3月会员大会，选举85届职员，对名誉顾问郑古悦老先生之逝世，表示哀悼与惋惜。盖郑古悦老先生曾任本会会长及董事多年，去年聘为名誉顾问，对本会诸多贡献，深值后辈景仰与学习，而今溘然谢世，实吾邑一大损失也。”

#### 参考资料:

1.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
2. 南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编《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
3. 《联合早报》
4. 《南洋商报》
5. 《海峡时报》
6. 《新加坡自由报》
7. 《叻报》
8. 《新国民日报》
9. 《总汇新报》
10. 许允之，金门会馆董事会会议记录，1929-1940年
11. 《国际时报》
12.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